考古人類學刊・第 74 期・頁 203-242・2011

上海解放後到改革開放前城市集居形式蛻變中的身體經驗*

郭 奇 正**

摘 要

上海是中國近代城市發展經驗中率先發生大規模商品化住宅生產的城市，城市中的集居形式一直為商品住宅市場所主導，居住的身體經驗往往是透過住宅商品的交易而被開發，並因著商品市場的定價機制具像化為可以訴諸價格差異的視覺表徵。現代城市基礎設施提供的舒適與衛生經驗連結著郊區地景中的小住宅商品的視覺意象，一同建構出當時潛在的空間消費者關乎集居形式的種種價值判準。

解放後上海面臨著社會主義國家對於住宅市場的強力干預，住宅經由國家的制度所分配，也使得居住的選擇侷限於國家規範的有限集居形式之內。受限於國家財政，長期匱乏的住宅供給也使得過去商品市場階段所生產出的既有集居形式（老上海里弄）被以市場之外的國家制度性分配與居住者自身的調整，重新賦予了新的功能與意義。

本文鎖定上海解放後的住宅發展歷程，意圖探究：

1. 住宅由從取之於市場到全然仰賴國家分配，居住的身體經驗產生了何種變化？個人的身體與家庭係如何自我修正以調適於新的集居形式之內？

2. 在國家高度干預的前提下，身體經驗的項目(categories)與內涵和市場主導的時期有何差別？

本論文透過對於前述的住宅形式與集體的集居經驗之變遷過程的理解，循

* 本論文寫作過程，承蒙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與蔣經國基金會補助的「醫療與身體經驗」研究群例行讀書會的長期支持與討論，以及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計畫編號：97-2420-H-029-002-MY2）的赴滬旅費補助，特此致謝。

** 東海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期許可更深入地理解身體經驗與物質條件及社會過程之間的對應關係。

關鍵詞： 身體經驗、空間商品化、社會主義改革、國家干預、擁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Bodily Experience with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Dwelling Forms between 1949 and the1980s

Chijeng Kuo*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contemporary urban history, Shanghai was the first city which had a great number of its housing units produced as commodities. Most of the dwelling forms were built for sale or to rent, and the majority of the living experiences were invoked and came into being by something made for real estate promotion. Therefore, dwellers' aspiration towards comfort and convenience often coincided with some distinguishable outward appearance and demanded for higher price in the housing market. That was the reason even the new bodily experience of comfort and hygiene in contemporary cities could be related to the modern infrastructure and public utilities; but they often were correlated to visual images about the detached bungalow-like housing units in suburbs. Judgments about dwellings manifested themselves within the factual living experience and visual contact with the outward appearance.

After 1949, Shanghai's original housing market encountered stringent intervention from the new socialist state. Housing units were no longer supplied by the market but were rather built and distributed by the state's new institutes according to new building regulations. People's dwelling selections were limited to specific kinds of dormitories which the socialist state could provide. Even more, insufficient housing investment not only reduced the housing supply but also compelled the existing housing units which had been built for sale or rent (e.g. the Shanghai Lilong) to be entirely distributed by the state. Consequently both the housing allotment from the state and self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Tunghai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ccommodation by the users resulted in dwelling forms being given new functions and meanings under the prevailing egalitarian ideology.

This paper focuses on Shanghai's housing development after the socialist reform of the 1950s and explores:

1. The transformation of dwellers' bodily experience that occur when all the housing units were distributed by the state and could no longer be obtained from the market or were necessarily appropriate to one's affordability and how the human body 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family members accommodated themselves to the new socialist scenarios.
2. Given a high level of state intervention, what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ategories of bodily experience and their connotations and those of the period when market forces ruled.

Through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formational process of dwelling forms and the collective living experienc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terpret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bodily experience, material conditions, and the social process within the period during which socialist ideologies prevailed.

Keywords: bodily experience, space commodification, socialist reform, state intervention, overcrowdi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　言

從傳統實質空間營造的知識中走出來面對身體經驗與日常生活

身體經驗是晚近建築學與都市研究逐漸重視的課題。蓋過去建築學領域中對於身體經驗的研究大多侷限於建築物理與設備領域的討論；在建築物理學的「熱環境」、「音環境」與「光環境」的三大領域中，冷／熱所引致的的舒適感是「熱環境」的主要課題，並透過建築物的鄰棟間格、座向與開口形式所關連的採光、通風、換氣等因素影響著空間使用者的身體經驗。熱環境之外，空間的壁體材料、空間形狀透過「音壓」、「殘響」、「駐波」等因子影響著聆聽的機能與舒適感；「照度」、「炫光」等因子則是光環境的重點。這些因子往往都可以對應著建築空間的實質形式，並在設備技術的精算之下，安排出最適空間形式。但從來，建築物理學開宗明義地提醒初學者：沒有「絕對」的舒適，僅有「相對」的比較舒適與較不舒適；建築物理學在判斷舒適與否時，也相信有一個寰宇性的舒適標準，相信在理性的量化評估之後，[1] 建築空間的舒適性可以透過逐一刪減經驗項目中引致「不舒適」的負面表列去追求「相對的舒適」。

建築物理學上的最適物理環境在專業上指向了要培養專業者「有能力」去設計並營造出「最適」的居住環境，但一個在圖紙上經過精密計算打造出具有最適物理環境的居住空間卻並不能保證對任何人均是適居；使用模式與持續維持相同使用模式的配合條件（programming）可能更具影響力。我們的生活經驗中有太多「不好用」、「住不習慣」的抱怨。同理，將身體經驗放在都市計畫（urban planning）或敷地計畫（site planning）的領域，相關對於「適居環境」的研究在過往亦多僅限於密度與尺度的探究，並往往透過抽離現實的理性分區（zoning）去強調居住上更為抽象的「居住品質」；[2] 但這類的取向顯然忽略了空間中不同使用者之間社會關係的個別安置，也無法處理傳統城市發展中隱而未顯的隔離與趨同。我們很容易在我們的生活環境周遭看到許多舶來的社區概念卻可以在短短一、二十年間完全走樣，在地居民用不一樣的使用方式取代了規劃者原先的美好社區生活想像。

傳統專業領域被視為可以較理性地處理身體經驗的建築物理學與都市規劃／敷地計畫領域事實上都無法處理人的差異在身體經驗上的種種影響。從晚近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開始將「身體」作為一種「經驗媒介」（experiencing agent）去重新解讀許多社會文化習慣的趨勢來看，由「身體經驗」的面向閱讀空間的實質形式及其意義，並經由將「身體經驗」放回其所處的社會與文化脈絡去重新理解、重新辨識日常生活中身體與環境互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動過程中的主體性，或許是我們跳脫專業的藩籬，讓空間專業有機會開啟跨領域的對話的重要起點。

究竟身體經驗可不可以在空間中重新被探索？如果我們認定專業領域過去從建築物理、都市計畫與敷地計畫學門透過公式與概念建立的「舒適」觀點是著眼於實質的設計與規劃，指向未來；則一個以跨領域的對話為目的的身體經驗探索，應該可以由何切入？將身體經驗放在日常生活與空間之中去討論，又可能產生何種意義？作為一位空間專業者，本文擬以「空間」形式的變遷對應到人與空間的互動行為，以及行為模式演變的過程作為文本，檢視日常生活中的身體經驗如何被啟發、投射，或者已經建構、習以為常的身體經驗如何壓抑調適於新的環境，並產生新的詮釋與標準。本文不僅盡其可能地透過田野調查試圖「如實還原」居住者發生於空間中的行為，也嘗試將使用者及使用者所處的空間放回其身處的社會文化中解析，藉以闡明特定行為模式在特定的歷史文化脈絡中的意義以及意義的層次。期望藉由此類以空間為文本的經驗探索，有機會去檢視空間中的身體經驗究竟有哪些「項目」？這些「項目」的改變、或項目內部判準的更迭如果視之為是一套文化認知中的符號系統，同一個社會中的個體又是如何透過相互可以理解／體諒的符號意義彼此互動？也就是說，在這一套符號系統中，在地的人群又是如何在物質條件與社會文化之中找到平衡點，並由一種普遍接受的在地知識／價值體系建構自己的符號系統？而回到身體經驗本身，我們過去所熟知的「舒適」、「便利」、「清爽」、「自在」、「愉悅」等抽象的身體經驗是獨立於社會物質之外的描述，還是在特定的社會情境中，身體與空間形式之間有了綿密但細緻的相互指涉？以及，身體經驗、居住空間在特定的歷史社會過程中有沒有共同演繹出來的認定。

為何要在上海的住宅變遷中探究居住的身體經驗？

上海是中國近代城市發展經驗中率先發生大規模商品化住宅生產的城市，房地產業由十九世紀 80 年代之後開始蓬勃發展，持續到 1949 年上海解放後數年才正式終止。城市中的集居形式一直為商品化的住宅市場所主導，居住的身體經驗也隨之為市場所穿透—居住者主體的身體經驗往往是透過住宅商品的交易而被開發，並透過商品市場的定價機制具像化為可以訴諸價格差異的象徵。

素來作為上海最具象的日常生活場景的「上海里弄」，過去在建築與都市研究的領域一直是被視為一種城市集居生活中的構築類型（building type）；其成排成列整齊堆疊的幾何秩序、重複出現且約略一致的面寬與縱深，素來被理所當然地視為城鄉之間密度差異的具體再現。但「上海里弄」在形式與意義上也不是單一的：從上海建城以來的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條型店屋、到開埠初期衍生自江南民居多開間面寬與二進縱深的「早期石庫門里弄」、進化到雙開間或單開間單進縱深的「後期石庫門里弄」、乃至於摻雜洋樓語彙的「新式里弄」、「花園里弄」，其形式積累與變遷所表彰的「物性」[3]與城市發展的歷史過程中中產階級追逐衛生、清幽、便利的居住「身體經驗」有著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由租界時代開始，上海作為中國境內第一個有現代城市基礎設施的城市，奠基在水、電、瓦斯等基礎設施所引介的居住舒適與衛生經驗，連結著郊區的地景意象與商品化小住宅的視覺經驗，一同建構出當時潛在的空間消費者關乎集居形式與舒適經驗之間的種種價值判準。

也就是說，在上海的城市發展經驗中，作為商品的住宅「物件」其形式「改良」與「修正」所表彰的「物性」在商品化的過程中，是透過特定意義的貼附來建構其在商品社會中的的價值；中介其中的是商品社會中準居住者自身的「身體經驗」。此種「身體經驗」既聯繫著本能的具體經驗感受，[4]也關連著身份、社會階級等種種想像，是鍵結價值的認定與物的形式變遷過程的重要關鍵。上海里弄這一種以長條型街屋作為「原型」(prototype)不斷進行形式積累的集居形式，是在國家基於衛生的理由對傳統集居形式擁擠現象的制度性干預下，藉由污名化內城區擁擠的中式傳統石庫門里弄以及對郊區花園里弄與新式里弄空間形式的刻意經營，由凸顯城郊住宅與內城區傳統且擁擠的中式里弄間的巨大差異，進一步操弄「物」的外在形式與身體經驗項目間的模糊連結，透過空間的商品化轉繹身體經驗項目的實質內涵。上海里弄商品化的歷史階段說明了：價值的產生雖來自於制度與交易的過程，但這些商品化過程所操弄的價值工程之項目，卻與關係著身體經驗項目的物質形式與特性密切相關。

1940 年代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上海，源於城市集體消費的嚴重投資不足與社會不公，社會對右翼國家親資本積累體制的忠誠漸被瓦解。帶著嚴重的房荒與內城區難以想像的擁擠與大量棚戶（貧民窟）問題，在毛澤東政權於北京天安門上宣告建國的同時，上海也隨之進入了社會主義體制。基於意識型態，解放後的上海住宅市場面對著社會主義國家的強力干預，住宅不再經由市場所提供，而是經由國家的制度所分配。解放初期數年間國家即取代了市場，成為住宅的主要提供者；連帶地也使得居住的消費侷限於國家所欽定的數類集居形式範圍內。受限於國家財政，長期匱乏的住宅供給也連帶使得過去商品市場階段所生產出的既有集居形式（既有的諸類上海里弄）被以非市場的國家制度性分配，加上居住者自身的調整，重新賦予了新的功能與意義。

面對此一戲劇性轉折的住宅生產過程，本研究擬鎖定 1949 年之後甫由資本主義過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渡到社會主義、但尚未全面改革開放進入市場經濟的特定歷史階段，意圖探究：

• 從市場到社會主義的分配，居住的身體經驗產生了何種變化？

• 在國家高度干預的前提下，身體經驗的項目(categories)與市場主導的時期有何差別？

• 個人的身體與家庭關係如何自我修正以調適於新的集居形式之內？身體經驗的內涵有何改變？

本文以上海檔案館 1980 年代之前的市政府與市委檔案、《人民日報》、《上海住宅建設志》與中國的《建築師雜誌》《建築學報》之文章作為理解 1949 到 1980 年代以前上海住宅發展狀況的主要基礎，藉以理解居住者關乎居住的集體經驗。在前述的認知基礎上，研究進一步在分類形式上鎖定數量最為龐大的解放前遺留下來的舊里弄與解放後開發的「新公房」，以訪談資料對應前述的住宅形式與集體的集居經驗之變遷過程，期望藉此更深入地理解身體經驗與物質條件及社會過程之間的對應關係。

空間去商品化前的宅地與身體經驗

城市基礎設施與空間商品化下的新身體經驗

上海在中國的近代史中，因為十九世紀中葉的開埠，而有了與同一時代中國其他都市截然不同的發展經驗。閉關自守的中國城市近代的開放，都和西方列強的擴張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上海的發展，則又因緣際會地加上了當時境內的武裝民變——是十九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之亂，讓清以後中國最富庶的江南地區的江浙資產階級一致地朝向區內唯一有外籍武力保護的上海租界集中避難。龐大的避難人口朝向一地快速集中，復加上長江沿岸的武裝民變讓外商在華的貿易業務量銳減，很快地，外商自己主動向駐滬領事與上海道台反映要求取消原本租界「華洋分處」的規定，上海租界因緣際會地形成了中國最早的房地產市場，從而，也讓這些付得起較高昂居住費用的江浙資產階級有機會分享原本尚未見於中國其他地區、僅見於租界的自來水、自來火等城市基礎設施。

龐大流動人口促成的房地產市場既然是 1850-60 年代外商在江南一帶最主要的收益來源之一，也促使了租界行政當局戮力於有利於房地產資本利得機會的典章制度之確立。此種以房地產資本的流通與再生產為主要考量的城市行政體制，也同時生產出了極不同中國傳統市鎮的城市空間；「上海里弄」（Li-long）就是構成此一不同於傳統中國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鎮的城市空間的主要構成元素。但其中，讓「里弄住宅」此一「空間商品化」後的一種新住宅類型明顯不同於傳統中國市鎮宅院或沿街的長條型店屋（shop house）[5]的關鍵因子，卻是 1860 年代甫由西歐引入的「自來水」與「自來火」等城市基礎設施。「自來水」取代了傳統中國社會水車送水或自井中打水、僕役送水的傳統慣習；「自來火」則是大幅簡化了薪材備用與清理等廚膳工事，兩者皆以便利之實吸引了輔到滬上的江浙資產階級競相追求配備自來水與自來火的新式住宅。從傳統上海在地的石庫門宅院開始，也因為水、電、瓦斯等基礎設施的接管要求，而漸次發展出「石庫門里弄」這一類高密度城市集居形式，並陸續因為租界的擴張、地皮價格的飛漲等因素，從租界開埠之初前五十年的「老式石庫門里弄」發展出 1890 年代之後的「新式石庫門里弄」、1910 年代前後的「新式里弄」、1920 年代城郊的「花園里弄」、或 1930 年代地皮價格高漲之後的「公寓式里弄」等類型的里弄住宅。這些過往不曾出現於傳統中國城市的住宅形式，其實都是衍生自城市基礎設施的具體要求，讓適度面寬與適度縱深的單元形式成為一種「原型」（prototype），透過私設的巷道縱橫連結，而發展出在近代中國獨樹一幟的城市集居形式。

事實上，1860 年代中旬後自來水廠與煤氣火房及兩者相關管線的建設，在租界設置初期本不是針對房地產市場而來，而是單純就海外僑民居住舒適性的考量。但顯然，這類公共設施的普及，讓許多住宅得以因為接入了自來水、電力、自來火等管線設施，而在商品市場上有了新的標榜題材，並成為付得起的潛在購買者追逐的認同標的。從最初由石庫門宅院演繹出的石庫門里弄，到慢慢衍生出的各式里弄，固然住宅外在形式上的演變顯而易見，但就關乎身體經驗與住宅意義的討論，我們尤其不能忽視透過租界直接引自西方城市水、電、瓦斯等現代基礎設施配套對常民日常生活的集居形式意義的影響。

舉日常生活的身體經驗而言，透過「接管到戶」以「自來」的形式將水與瓦斯引入居住者的個別私領域即是革命性的嶄新身體經驗：許多私密的身體照顧得以由公共空間（使用公共茅房、公共澡堂等）移回個別的私領域中進行；這也提供了因太平天國之亂而被迫遷徙進入租界避難的江南華籍菁英一種前所未有的居住經驗，帶「衛生間」[6]的里弄住宅因而成為商品化的住宅市場上高階的商品；私密行為向純然的私領域移動的可能性遂順勢成為一種被追求的空間消費，水、電、瓦斯即開即用的便利性聯繫著排列整齊且嶄新的里弄空間與石庫門外觀，在高階的房地產市場上，一同對抗著舊的上海縣城所在地「南市」的大院宅地裡仰賴僕役服務的水車、糞擔、蠟燭、油燈與高懸的燈籠後陳年的恢弘氣勢；身體經驗開始與空間形式有了初步的對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日常生活中身體經驗開發的物質基礎及其形式認同

正因為現代化管線設施引入所能感受到的新身體經驗關鍵在於城市基礎設施管線的鋪設，此一面對自身身體的新秘密基地卻並非像購買一件豪華家具般地可以在一般的家戶中簡便設立：[7] 對外它牽涉到自來水的牽管、掛錶，對內，則需處理自來水進入宅地空間後的引水與排水管線埋設；若在地面層以上樓層設置，還需考慮樓面板的防水與否。[8] 種種實質的要求，顯然並非所有的當時既存於城市空間中的住宅（包括租界成立之後才興建的舊式石庫門里弄）都有條件安置引入；**集居形式中的身體經驗因而浮現了物質條件的面向**。

也正是因為由歐洲引進利用公共管線傳輸的新式的基礎設施都必須「照錶收費」(metering-charged)，對單元的建築體因此增加了必須有一出入面「面臨公共通道」的具體要求。對於處於房地產市場萌芽之初的上海租界，此一具體要求在商品化追逐利益的前提下，明確地指向了如果要容納更多的戶數，就必須讓每一單元戶都必須在私有的土地上因為「私設」供公眾通行的「私設巷道」的留設，公共的水、電、瓦斯管線可以進入地產商私有的土地循此私設巷道送水、送電、送瓦斯給私有土地上的每一戶住宅；而每一戶住宅皆可以不通過鄰戶的建築物或土地直接有了一可以裝設水錶、瓦斯錶、乃至於後來電力引入後的電錶的「公私介面」。這條介面線即是建築管理規則（Building By-laws）中所謂的「建築線」；[9] 這類對於建築單元配置的明確要求，催生了今日所謂的「上海里弄」。

顯然，個人隱私追求的空間消費在當時並不是任一暨存於租界或上海南市的任一住宅均可以任意搭配選購的住宅配備，原因即在於公共管線牽管到戶的「最後一哩」（the last mile）往往也是管線成本最高之處，尤其針對如上海縣城所在地南市這一類已經高密度發展的舊市區；租界外圍尚未有密集建築物的新發展區明顯地更獲青睞。因此，付得起相關空間消費的族群也必定受限於住宅區位的營造條件，要接受住宅商品市場所搭配提供之私密、舒適、便利之外的其他空間表徵。也就是說，在集居的身體經驗探索發展的初期，舒適、便利、私密固然本就是一種難以形體化並單獨地被描述與定義的身體經驗，但透過商品市場，使用者卻可以透過整套住宅的購置或租用來完成舒適、便利、隱私的空間消費，身體經驗關鍵性的配備「規格」因此不可避免地**連結到可以區別差異的外顯形式**。放在上海租界的集居形式發展過程中，明顯地差異更具體投射於有軌電車路線可到達、的郊區新式里弄與花園里弄上。

於是乎，對比於電力設備陸續引進租界後環繞南京路等商業街肆發展起來喧鬧嘲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至深夜方歇的內城區，泥城濱（現今的西藏中路）與跑馬場（現今之人民公園）以西區域直到靜安寺附近幽靜的郊區，在 1905 年第一條有軌電車線開始行駛之後，已不再遙不可及；1905 年有軌電車線的開通顯然是身體經驗得以另類全面開展的另一關鍵事件：電車既大幅壓低了遷出內城區、遷入郊區的移動成本，但電車票價也同時是這批追求幽靜環境的商業菁英所欲區隔自身於內城區的中下階層最為直接有效的門檻。不待郊區的地產開發形成氣候，1908 年首次發生於極接近商業中心南京路的蘇州河兩岸的鼠疫更加速了中產階級遷出內城區的速度。此後，每一次租界工部局（Municipal Council of Shanghai）對中式住宅的衛生檢查就是又一次對傳統石庫門里弄的污名化，也同時成為正要沿著電車線向西延伸的郊區「新式里弄」住宅在形式上要明確區隔的負面標的。

商品市場上「新式里弄」標準配備的「衛生間」，正好與租界工部局衛生調查後持續宣導的衛生指標與下水道污水系統的設置呼籲相呼應。「衛生間」的設置是土地價格與營造價格折衝協調後住宅本身對「設備」的追加投資，是「投資成本」的考量；自來水與污水系統是否完備，則是「區位」的實質基礎設施條件。兩者，都恰恰好因為內城區的極度擁擠，騰出空間更改追加「衛生間」不易、且所費不貲，以及，不易在既成發展區重新開挖配置污水管線等因素，使得城郊的新式里弄住宅得以因基礎設施較為齊備的區位條件、較為低廉的土地成本及較寬裕的基地分割（subdivision）所形成宅地條件優勢，壟斷了在意衛生條件者的新住宅商品市場。為求與屢屢爆發疫情的中式里弄區隔而刻意經營的西式建築外貌，因此得以趁隙與衛生間／下水道等進步而衛生的印象籠統地整編在一起。新的集居生活形態被嵌置在刻意安排且配備新式「衛生間」與西式廚房設施的城郊花園洋房與新式里弄社區中，透過媒體的渲染與訴求，成功地打造了新宅地空間本身與石庫門里弄的**差異**，召喚著當時租界社會中產階級白領工作者對城郊居住的認同。

身體既是空間價值緣起的要項之一，管線設施的引入住宅是基於身體的目的；但資本化的空間生產過程中，透過商品市場由外賦予的價值也讓居住者必須同時面對並經歷實際的身體經驗與經驗向外投射的想像消費。國家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在前，意圖全面商品化空間消費的地產資本緊追在後，透過媒體與消費大眾的口耳相傳，在逐步以新基礎設施的「物性」強化消費群眾對舒適、衛生、便利等需求的同時，也進一步將「家」建構為一套「隱私且舒適、衛生的地方」。自此之後，即或租界回歸國民政府的統理，以及因為住宅的集體消費投資不足，在低階的住宅市場上擁擠狀況變本加厲，但這種基於身體追求舒適／隱私／便利目的空間價值的取徑，在上海進入完全不一樣的意識型態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統理階段以前，給「家」一個可以區辨差異的實體空間形式的意圖，卻一直左右著住宅消費者的價值判斷，直至下一個支配性的意識型態全面臨幸這個城市方止。

社會主義國家介入下的去消費的居住條件與私密界線的挑戰

社會主義意識型態下的住宅生產

由 1860～1940s 上海住宅的商品化生產階段，身體經驗的開發搭配著市政建設的持續現代化、市區的擴張，連結著不斷推陳出新的里弄住宅形式，一如前一節所述，係在高端的房地產市場上攻城掠地。上海中產階級以上的族群也得以藉由消費在新的城市空間中找到安置其自身的社會位置。住宅，不僅是居住之所在，也同時是不斷藉由社會生活的引入宅地空間之中，讓住宅的區位條件、住宅內部的空間形式以及其裝修等，無一不是連結著居住者的社會身份與社會關係，藉由消費讓居住者完成其對自身社會位置的想像與定位；增改建與換屋也都是一種調適宅地空間的消費行為，為求與居住者當下或未來的新社會關係及位階相呼應。但上海也一如所有工業革命後的大城市一般，被大量湧入的城鄉移民的居住問題催逼的喘不過氣來；這些龐大的勞動族群收入微薄，無力負擔高昂的房價或租價，因此不是城市房地產業鎖定的服務對象。除了少部分宗教慈善團體與非常少量的企業主基於悲憫所建設的廉價工人新村，房地產市場上並沒有專門為這一類蓋其勞動力係這個工業城市發展的主要條件之一，於是乎，非正式部門（informal sector）的種種經濟行為浮現，地下的借貸與賒欠連結著非技術性勞動力所自力完成的非法的增改建[10]安置了這一族群；擁擠與環境衛生的問題也一直是市政會議上的主題。

事實上，從 1920 年代中期之後，上海除了高端的住宅市場之外，常民的日常生活已經和「分租」（sublet 或 sublease）整個連結在一起，「二房東」普遍存在於市區絕大部分的出租房舍中，原屋主無力也無誘因整修房屋並維持單元中單戶居住。上海彷彿複製了所有曾發生於倫敦、曼徹斯特或巴黎、紐約的城市發展經驗，龐大低收入居民居住問題的嚴峻都曾迫使國家正視，[11]但在這些資本主義城市的統裡機構也多半一籌莫展，莫衷一是。租界歸還後的上海歷經了針對住宅需求一事無成的國民黨五年的短暫統治，帶著嚴重的房荒與住宅問題進入社會主義統理階段的。

改善居住條件理所當然地成為宣稱與無產階級站在同一條陣線上的新政權責無旁貸的歷史任務。等不及北京中央所律定「*按照系統，整套接收，調查研究，逐漸改造*」（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著 2001：396-399）的接管上海步驟，一個以「社會主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模範社區」為構想藍圖的住宅群興建計畫立即就被排進了解放後次年的市政議程中；位在普陀區的社會主義第一個工人新村「曹楊新村」於 1951 年開始著手規劃與興建（上海住宅建設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8：21）。

作為社會主義理念的率先實踐，「曹楊新村」雖僅有 1002 戶，卻因為首批居住者多為原先居住在棚戶區的貧戶與工人、但被以「勞動模範」（簡稱勞模）的姿態由工作單位舉薦，[12] 因而具有高度的象徵意義，頗獲重視。同年十月開始，上海市建設委員會（以下簡稱「市建委」）開始著手研究由國家透過國營企業建造工人宿舍解決住宅問題的可能性。年底，即在市委大會中確定了 1952 年要「*再建築一批更大規模的工人住宅*」；規模宏大的「二萬戶公房」計畫於焉起草。

但是，杯水車薪，對於上海這樣一個積累了自身長期以來對社會低階勞動者居住與移動的集體消費不足之龐大市政負債的前資本主義城市，住宅問題的解決已刻不容緩。當時市建委的調查顯示：全市共有 530 萬居民，市區 450 萬，其中的 300 萬勞動人民「每人平均居住面積」（以下沿用上海官方文書慣用的簡稱「人均面積」簡稱之）是 3 ㎡；但也有為數不少人均面積僅有 1 ㎡的案例，亟待援助！低人均面積也同時意謂著只要國家願意適時地介入干預，即或僅讓人均面積達到 4 ㎡，也已經是超越 30%比例的「大幅提升」；遑論人均面積僅 1 ㎡的特別貧困對象。因此，在社會主義意識型態的驅使之下，共產黨中央是一面倒地意圖在掌握政權的初期即以國家之力一肩扛起，也試圖以親勞動階級的市政建設來換取低階勞動人民的忠誠。市建委內部遷就國家財政現況，明令「*建築標準不宜再高，待以後條件許可再逐步改善*」（上海住宅建設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8：22）。也因此，確立了在曹楊新村、控江新村之後共投資 5677 萬元人民幣的「二萬戶公房」計畫的實質內容：總建築面積 60.76 萬㎡，共計二千個居住單元，每個居住單元 10 戶，由此十戶去共享廚房與衛生間（廁所），浴室另設。雖然含公共樓梯、浴廁及廚房平均每戶不到 30 ㎡，[13] 但對當時大量勞動者仍無屋可居的狀態，計有十萬職工眷屬受惠遷入。

即或提供的標準甚低，但是對過去無屋可居者，卻是「從無到有」的恩寵!此舉不僅強化了低階市民對社會主義政權的忠誠，也大大鼓舞了以意識型態初掌政權的市政當局。市建委循此概念與標準繼續擬定了二十萬工人城市建設用地擴展圖（圖 1），並對市管的 17 個單位編列預算協助完成共計 11536 戶的職工住宅。同時，著手透過「公私合營」的方式，意圖收編租界時期遺留下來的大量私有里弄住宅以利分配。[14] 種種作為，清楚地說明上海城市住宅的建設已經逐步地收攏在國家的手裡，國家一肩扛起成為唯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住宅供給者與分配者；住宅市場就此完全消失。[15] 此一態勢，也一直持續至文革後的改革開放之初。



圖 1　上海城市建設用地擴展圖（資料來源：鄒時萌等編 1994）

人均面積固然是提升了，但究竟社會主義上海提供給市民的是什麼樣的住宅形式？1952 年率先完工的曹陽新村是帶有極高的實驗性的，一方面源於社會主義國家「城鄉一體化」的意識型態，另一方面則得因於早期的規劃者曾受霍華德（Ebenezer Howard）的「花園城市」（garden city）理念及其後衍生的「花園城郊」（garden suburbs）開發形式上的衝擊。[16] 最初的規劃者汪定曾先生在曹陽新村完工後的《建築學報》上，闡述了國營的華東設計院對「鄰里單元」概念在實質空間上的具體的想像：

> 「新村總面積 94.63 公頃，半徑約為 0.6 公里，從邊緣步行到中心約在 7-8 分鐘。中心設置各項公共建築，如合作社、郵局、銀行和文化館等。在新村邊緣設立小菜場及合作社分銷店，便利居民在住宅附近購買日用品。小學與幼兒園不設在街坊內，而是平均分佈於新村的獨立地段內小孩入學由家中到學校不超過十分鐘的步行時間，…新村的人口是比一般的鄰里單元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大、實際上，它已經是一個小住宅區的規模，這是考慮為了維持一定規模的公共建築和居民經濟狀況而擬定的。」（汪定增 1956：2）

事實上，由於係透過國家的制度性分配，而非透過地產商將本求利的錙銖必較，透過曹陽新村引介進入社會主義中國的「鄰里單元」的概念，有著比傳統的上海中產階級城郊花園里弄社區更為完備的公共設施，普遍被共產主義社會歡迎。但形式與尺度上，卻因為曹楊新村因空間氛圍上遙相呼應上海租界年代的郊區中產階級花園里弄，因而在共產黨內部引起爭議；[17] 仿自歐陸與美國大面積城郊社區蜿蜒曲折的如畫風格（picturesque）的路徑（圖 2），也被認為是土地使用上的不經濟。1952 年之後，分佈在滬東、滬南、滬西工廠區附近的 9 個「小區」組成的「二萬戶住宅」，在配置形式上曹楊新村的如畫風格的「鄰里單元」已完全被引自蘇聯的「小區」取代了。



圖 2　上海曹楊新村原始的規劃配置平面（汪定曾 1956：3）

曹陽新村在鄰里設施的配套內容上受歡迎，但在形式上卻受爭議，原因即出在社會主義「平等主義」（egalitarian）的意識型態下對於「特質化」的不安。引自蘇聯的「小區」形式與配套上的「規格化」，在社會主義國家大舉擴張工業區與衛星城鎮建設的 195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年代後期之後，透過由國家投資，統一規劃、統一設計、統一施工、統一分配的方式，顯然更容易獲致社會主義國家期待的城市風貌。1959 年由宋慶齡剪綵落成的「張廟一條街」把國家領導人想像的社會主義理想城市圖像給具體化地呈現出來：有紀念性的道路軸線，且主要的道路軸線往往以斜角交叉的方式斜交於街區最中心的管理機構所在地，藉佔有支配性的地景位置強化空間中領導者與庶民的相對關係。除了紀念性軸現端點的大型官方建築物之外，絕大部分市民所在的街區則都是千篇一律無電梯的板狀建築物：鄰棟間格固定，以有限的幾組平面單元以連棟接續的方式集結成可以延續數十到百公尺的單一建築量體。沿街的住宅量體一樓是商業空間，二至五樓則是公寓的住家的單元，街廓內則全數是住宅單元，且厲行「大街廓」的策略，在街廓內部集中留設鄰里單元所需的澡堂、食堂、公共廁所、垃圾處理間等公共設施；且往往一至兩個「超大街廓」（superblock）[18] 就是一個「街道管理委員會」[19] 的管轄範圍。

這是一組財務上絕對理性，經濟實用但又在形式上可以服膺於特定政治目的的空間形式。其「規格化」與「去特質化」的強烈傾向，在國家資源匱乏的種種財務考慮之下，不僅展現在小區的配置形式上，也同步展現在單元空間的設計上。由曹揚新村與二萬戶公宅開始，國家所提供的新住宅單元即是共用衛生間與廚房的「一室戶」：住宅單元以類似旅館的形式由一條筆直的走道串接，在每一層樓的梯間旁邊或走道盡頭是衛生間或廚房所在的位置（圖 3）。時至 1950 年代中期「一五」（第一次五年經濟建設計畫）執行檢討之後，「節約」的訴求甚囂塵上，[20] 前述的物質條件更見緊縮；4 ㎡的「人均面積」是相關技術官僚堅持的最後指標。[21] 在此政策與社會氛圍的侷限之下，國家欽定的居住條件以大致成形：**首先是服務性的空間一律「遷出」住宅單元之外**；由於有管線與防水的顧慮，廚房、衛生間與浴室這一類的空間單位面積的營造成本高於一般的住宅平面，這些相對營造成本較高的空間（廚房、浴室、衛生間）被要求以「共享」的方式集體提供，而不設置在個別家戶的住宅單元裡。在「每增添一室即可增添安置一戶」的算計原則下，國家可以任意地經由調度共享比例（每多少人一馬桶，每多少人一爐灶）來減低住宅的整體支出，但仍保有人均面積數值，於是制度性地形成了**公共空間極大化、私密空間極小化**的社會主義住宅特徵。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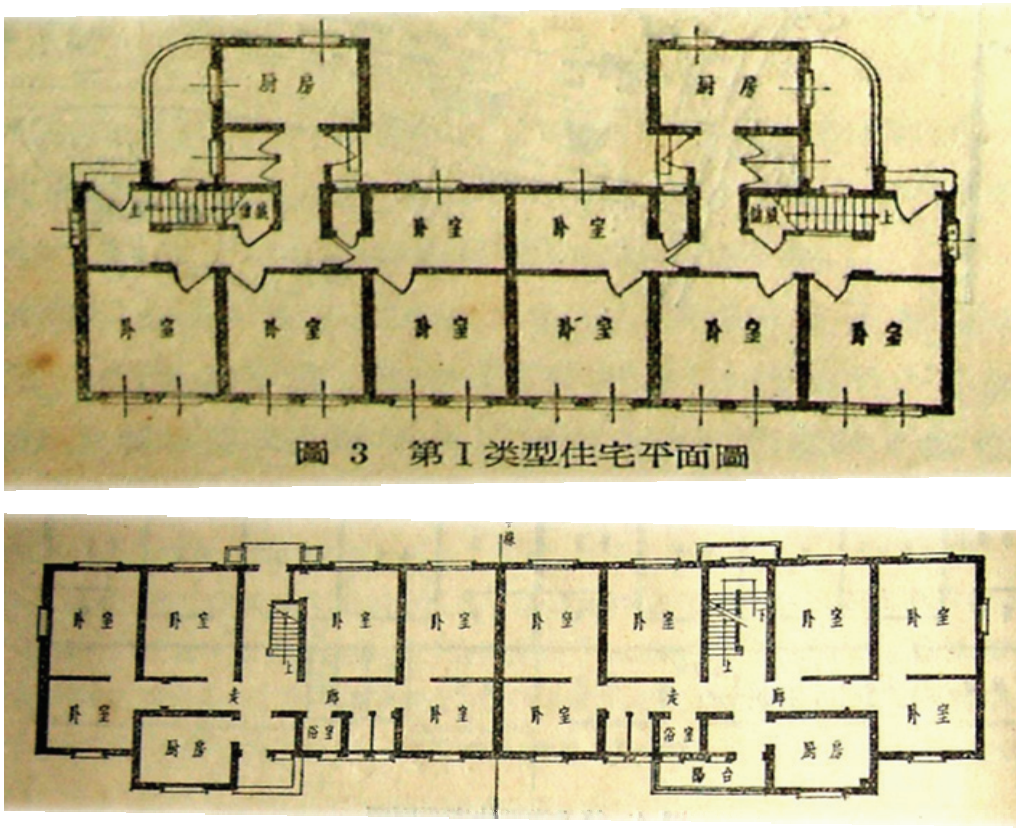


圖 3　曹楊新村的住宅單元平面（圖中可以看到每一樓梯間上樓後一條直通的走道連接兩間「一室戶」與兩間「兩室戶」（汪定增 1956）。

但是，解放後國家提供的住宅也不是僅有「一室戶」此一單一選項；許多資料顯示，官方也允許「一戶一室半」、「一戶兩室」、「一戶三室」乃至於「一戶四室」、「一戶五室」的單元形式，甚至有個別類型分佔小區總戶數比例的規定。但在住房需求窘困的上海，這種規定似乎僅止於一種「想像」的理想狀態--預期著總有那麼一天，上海市民可以舒適地居住在原本就為單一家戶所安排設計的空間，不需要面對「分租／分住」的隱私問題。上海市建委很快地就理直氣壯地提出了「**合理設計、不合理使用**」的說詞；[22] 以房源不足下的暫時過渡「合理化」了多戶共住一戶住宅單元的必要性。

這種說法其實也在回應了國家在住房供給上資源不足的窘境：1955 年的「公私合營」制度變相「充公」了絕大部分的上海私有住宅，許多私有住宅是多室戶的中產階級高級宅院，在社會主義「公平」的大原則之下，國家不可能厚此薄比；必須要有一套全面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說法與制度同時面對國家傾其力完成的新村／小區與既有的大量里弄住宅。

1950 年代中期以後，住宅市場既然已經被取代，國家成為唯一的房屋供應者與分配者，許多市民根本也無從選擇，只得默默地接受權宜的「不合理使用」的「合理性」。因此，即或有多室戶的戶型存在，直到改革開放以前「一室一戶」一直是國家安置計畫的主要計算依據；統計的數據多僅只與人均居住面積與住宅計畫的總戶量，公共設施的配套比例則多不見於官方的統計數據之中。

常民日常生活中的居住實踐

從可以自行針對自己的經濟狀況與社會條件在市場上自由選擇適切的住宅，到國家一手取代市場，變成住宅的唯一分配者，常民在住宅空間中的日常生活有什麼樣的轉變？有哪些是受限於物質條件不得不然的調適？這些物質條件如果對絕大部分市民是普同的，調適之間居民之間的認知系統如何被重新建構？相較於之前有自由市場的狀態，社會主義的統理階段居住的身體經驗在項目上與內涵上有哪些改變？這是探究身體經驗如何回應集居形式的蛻變的重點。

解放初期，對於接受政府照顧遷進工人新村的新居民來說，「共用廚房」、「共用衛生間」、「共用浴室」是無從選擇的官方標準。但相對於過去在棚戶區幾十戶共用一支水龍頭提桶排隊盛水以及每日倒馬桶，甚或是船民「以船為家」的生活形態，即或「共用」，也是一種國家對工農階級善意的福利。這種「從無到有」的過渡，使得絕大多數居民有房得住的空間經驗中打一開始就必須習慣於在公共的領域中進行如廁與洗浴等照顧身體的私密行為。

私密的概念既不曾「奢華地」被經驗過，空間規劃設計的技術官僚所安排之「『外移』部分家居中的空間（例如廚房與衛生間）『共用』解決」以節省空間的權宜也就算不上犧牲。事實上，上海人對住宅空間的窘迫對並不陌生，多數上海人早就在租界的時代就已經習慣了多戶共住一戶的分租狀況。但與解放後的狀況不同的是：只要住宅市場存在，即或不全然是依據金額大小決定分租與否，住戶多還能夠自主地決定可忍受的擁擠程度，依據遠近親疏程度獨立判斷要不要與誰共用廚房與衛生間；[23] 解放後到 1958 年開始執行戶口管制之前，對許多外地的非上海人，移居上海意謂的發展機會還是讓很多人前仆後繼地持續湧入上海，[24] 尤其是有親人或朋友在上海居住者；明知上海擁擠昂貴的居住條件，但著眼的正是個別家庭還是可以依據自身的經濟能力與家族組成決定收容與否，家戶長仍保有自主意識地決定在意的經驗項目的優先順位；直等到國家力量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面的介入這種自己可以決定的平衡才告終。[25]

一旦被迫全面接受由國家欽定的廳／室數目與大小，並且聽命分配，傳統依據支付能力（affordability）、關係的遠近親疏等線索將某些人給兜在一起、某些人又被排拒在外的原則全部不再有效，自我調控的公開／私密界限也被替代；取而代之的，是國家對於「『合理』人均面積」、居住單元廳／室數量、規模大小等可以量化的數據。

這一類的改變，尤其對解放前即已存在的舊式里弄住宅或公寓式住宅的使用者衝擊最大：無論是品質極差、沒有衛浴設備的石庫門里弄，或是品質較佳、有獨立衛浴設備與廁所的新式里弄或公寓里弄，1950 年代中期國家透過「公私合營」解除自由的住宅市場之後，國家財政的困窘表現在新房屋供給的不足與「房管所」對居住空間分配上的強力干預；多數的住宅單元被迫在解放後的重新分配過程中擠進了超過兩個以上的家戶（households）。以「室」為家戶計算單位的概念一旦滲入這些既成街區的住宅單元之中，往往一棟原先僅設計給單一家戶居住的四室兩廳或五室三廳的洋房空間可以在短短十餘年不到的時間中被蠶食為八到十戶共住的住宅。[26] 連帶地，過去家居空間中的私密界線也從而被徹底地打破：既有的廚房與盥洗／洗滌衣物的空間被迫多戶共用，甚至以樓層作為分群的單位，再隔出兩至三個小型廚房分屬於不同樓層的兩三個家戶共同使用；衛浴空間亦同。

也正是這一種國加強力介入下的有限物質條件，迫使在地的認知系統中必須把「門戶」一詞重新定義：倘若可以關起門來的「室」是家居空間中個人私密性得以建立的實質條件，「門」的存在則建立了空間中相對的公共與私密性格。「門」是一般家戶中由公共過渡到私密的介面之所在，描述治安甚佳的成語「夜不閉戶」一詞後面那一扇沒有被關上的「門」正卡在這種公共到私密的介面上；習慣中我們不會說睡覺不關房門是「夜不閉戶」，但就寢前卻不關上可以人來人往的通道上的大門卻令為官者大書特書。「門戶」一詞因此格外強調個人對周遭環境的人、事是熟稔／陌生、設防／撤守防線的自我區辨。

同樣地，「穿堂入室」既是一種不言而喻的莽撞，也在傳統空間中「堂」（廳）與「室」的區隔中說明了不同形式與位置的「門」如何在家居空間中反映了機能的分化與私密的等級。但居住條件的窘迫，「一室」容納一戶的官方標準卻迫使解放後上海的絕大部分家戶都必須要去面對**傳統家居空間中私密／非私密行為的重新分類**，並實質地展現在原本家戶大門以內私密活動的重新部署、以及**私密層級**（hierarchy）的重先界定兩大議題。

也就是說，如果「廳」與「室」是家居生活中較為私密與較為公共的空間區分屬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並各就定位的一套作法，是家居功能藉機能分化來權衡住宅舒適度的一項指標的話，[27] 明顯地在解放後的卅年間，對官方而言，「室」的數量之累積優先於「廳」的設置，許多勉強可以稱之為「廳」者僅不過是室內過道的轉折或稍寬一點的走道（圖 4）；作為雜物的堆置會比作為「用餐」或「休憩」、「會客」等具體的停留行為更為恰當。普遍的上海市民回應此一物質條件的最直接的方式，是將起居與用餐功能的「廳」引入一室戶中的臥室，或是二室戶中進入較大臥室；家戶長的臥室中床旁的一條沙發與摺疊桌往往兼具全家起居與用餐的所有功能（圖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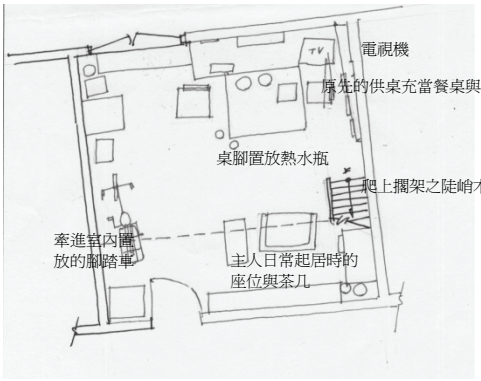


圖 4　加寬了的梯間轉角或過道往往成為可以關起門來的「室」到無須設門的「廳」的過渡形式。[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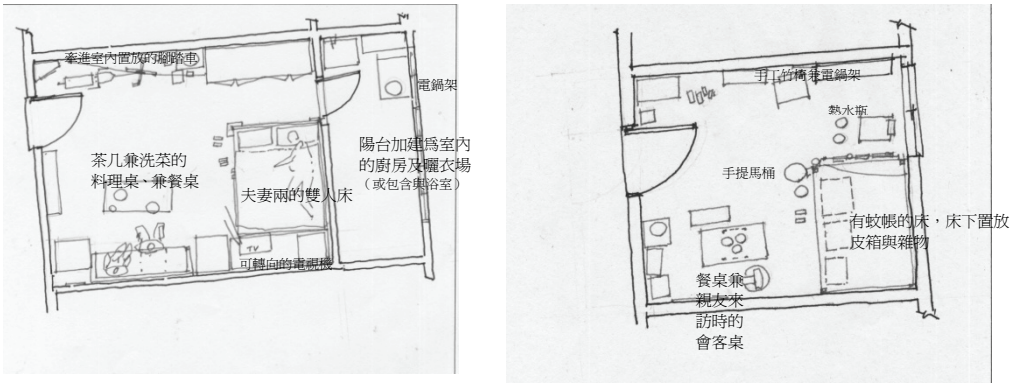


圖 5　典型的上海一室戶單元，將起居與用餐的空間皆引進臥室之中，置於床旁，臥室「門」的功能則蕩然無存。[29]

在解放後窘迫的物質條件下，是國家的中介，制度化地將一家人的生活限縮在「一室」的範圍內，但允許將廚事操作、如廁、淨身、社交等功能放在家戶可以關起門來的「室」之外、宅地空間大門之內的其他空間解決。於是乎，哪些行為可以推出「室」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外？哪些行為一定得關起門來在室內進行？居住的行為如何在有限的空間中重新部署？以及，衣著上、言語行為上如何面對這種匱乏的物質條件之下「必要」的「對外開放」，就需要不一樣的集體性權衡思量。

空間與日常生活網路建構中的主體性

可建構的個人領域及其彈性邊界

正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對居住的物質條件的全面監控、有條件供應，解放後的上海市民重新建構了其日常生活的「公共性」。「平等」的意識型態使得過去一度是中產階級以下居民才被迫經歷的分租共用，至此成為普遍的市民生活經驗。由於居住單元空間面積是極其有限地被算計與分配，家居生活空間的侷限，迫使日常生活中必定得挪出部分的居家行為到「『室』外」的公共領域中，也迫使居民絕大部分的時間都必須出入於半公共（semi-public）乃至於私密的空間之中（圖 6），並不斷地在這些空間之間劃定「公」與「私」的界面（interface）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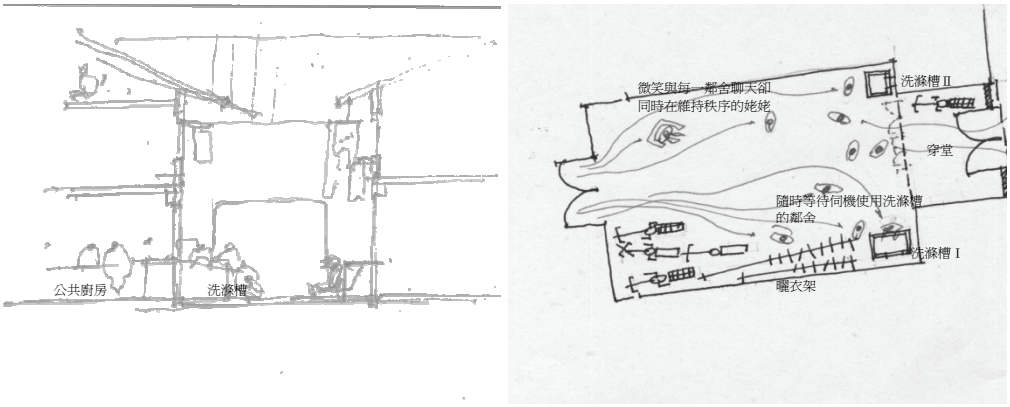


圖 6　既存的里弄住宅中的天井往往成為共用的盥洗間、洗滌衣物空間及曬衣場。[30]

「共用」（shared）自此成為必備的生活模式！不論新建工人新村、或是傳統里弄住宅裡的住戶，即或公共共用的空間都是在極近的步行距離之內，還是迫使了住戶必須要學習家戶空間的適度開放與暴露，連帶地過去關乎「身份區辨」的行為也往往必須要適度地暴露於鄰戶之間。飲食最容易表達家庭之間生活習慣的差異：訪談中有幾位七十餘歲的住戶提及了在公共的洗手檯洗菜時鄰居指指點點時的不自在，自此之後家人更謹慎於許多細微的食物處理方式，儘量求減少繁複的工序，不要多佔用廚房；來自于寧波老家自豪的功夫菜必須更小心地關起門來自賞。另有一位文革前幾年才出生的女性也提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了他文革期間父親過年想幫家人加點菜，偷偷透過關係買了一條魚回來處理，但還是在里弄間傳開來的記憶；鄰居紛紛猜測他們家有何事需要慶祝？為何隱瞞？

飲食習慣作為階級身份的表現，除了表現在用菜的內容之外，還包括了餐具與餐桌的禮儀；這在平等的意識型態與節約的口號盛行的 1950 年代後期到文革之間，更是讓很多曾一度富有的家庭戒慎不已。訪談對象中一位七十餘歲的陳先生回憶到 1950 年代末期之後，每逢清明母親帶著他如何偷偷摸摸地躲在家中僅存的頂樓陽台上，拿出偷藏的銀質餐具一支一支地擦亮後祭祖；這些銀質餐具早在三反五反之後，即已經不敢再拿出來使用。

廚房的共用，由於取水與倒水的種種限制，不可能全部打一臉盆水關起僅存的「室」之門處理，讓個別的住戶從食材的內容及料理習慣、餐具的使用、乃至於是否常常在家招待客人等，都被迫鋪陳於鄰戶的視覺、嗅覺與聽覺之中。[31]「趨同」（convergence）遂成為在共產主義社會安身立命的學習功課之一；究竟趨於何種類同，其實是一個動態的平衡，端視國家的資源在居住部門投放的多寡。[32] 但顯然，匱乏的狀態已經成為一種新的「常態」（norm），並反過來合理化了權宜之下的日常生活；尤其是制度性的「共用」在早晨起床後的洗臉刷牙等盥洗行為中所衍生出的群體生活模式。

由於多戶共用一個衛浴設施，每日上班／上學前的忙碌迫使大家必須可以接受在同一時間每位要使用水龍頭／馬桶／小便斗者的機會皆是均等的，隨時待命（stand-by）遂為其重點。基於衛浴設備一空出即必須立即搶用的機會考量，上海人普遍地並不介意一早起床後立即上陣排盥洗；人手一只漱口杯站在走道上刷牙，或沾濕了毛巾在走道上用力地抹臉等行為，都說明了一種不長時間佔用水龍頭／水槽與馬桶／小便斗的善意。換下睡衣與否不僅不在考量的範圍，也是「共用」生活下長期衍生的體諒與默契。[33]

這種接納家居生活適度暴露於公共之前的權宜，事實上既是社會主義階段物質條件匱乏的具體表徵，但也某個程度地回應了社會主義體制內在所允許且持續運行的居民相互監控體制；[34] 國家透過其所構築的工人新村空間與對既有里弄的介入分配，滴水不漏地以允許的集居形式支持了這一套監控系統。離開這一套監控系統的唯一作法，就是回到可以關起門來的室內。

有限的室內平面中，為求最極限地使用每一吋空間，善用垂直向度就成為這個階段上海人必學的功課之一；官方也傾其力地透過設計院協助居民理解空間複合使用的各種可能性。租界時期因避難而湧入大量人口時的擁擠現象及其衍生的集居形式—繁複的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架、擱層（vertical repartitioned）遂弔詭地在解放後的宅地空間中再一次復辟，甚或全面擴及至上海社會。

浮動的個人領域邊界下，絕對的個人空間已不可得。權宜之計，在於空間中家族成員重複的使用，使得每一項家具、每個角落都有不同時段多重的歸屬與機能。三度空間的充分利用加上使用時間的錯開——如何善用家庭成員生活日常生活節奏的錯移，形成了四度空間的時空治理，也是以浮動、多重負載的方式處理狹小空間所累積的智慧的具體表現。家庭成員在不同時段輪流出入使用居家的空間，輪流維持成員在最需要私密的時段絕對的私密或許是社會主義宅地內罕有的奢侈，但卻可以透過彈性的調配與默許具體實踐出來；一張特定的書桌桌面、甚或桌面一角，或是床上特定的睡眠角落，成為家居空間之中個人不被碰觸侵擾的最後身體邊界。

上海的底層社會一度因其住宅需求對房地產商無利可圖，而被推入住宅分租（sublet／sublease）的二級市場，擁擠與髒亂曾被視為底層社會難以脫困的宿命。社會主義革命適時地出現，以救世主之姿出現扛起了住宅供給的責任，終止自由交易的資本主義市場機制，但終究，住宅作為集體消費的一環，既召喚著國家的強力介入，卻也在極度公平分配的社會實踐中，全面地承受著國家父權地一肩扛起後的總總後果。這種極限狀況下對空間機能與潛力四度空間地窮盡使用，也在日復一日習而不查的身體實踐中，內化為居民對宅地空間新的認知標準，且成為一種可以接受的常態（norm）。

上海人習稱的「實惠的」空間佈局，不僅在尺寸上錙銖必較，也對住宅「室」的數目的擴增極其謹慎低調；[35] 這些都可以視之為是長期的物質條件下身體長期調適的結果，身體經驗也有了截然不同的內涵。經歷了 1950 年代到 70 年代的極度匱乏，1980 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逐步鬆動了住宅市場，政府也慢慢地將住宅提供的包袱卸給可營利的單位及個人，空間的商品化啟動，但這些身體經驗並不因為商品化的重新啟動而被任意棄置翻轉，反而呈顯出似已內化於上海人日常生活的實踐之中；在錙銖必較的空間經營中壓榨出空間的每一分潛力的行動中，面對空間商品化，面對空間不僅是大小、也是區位都開始可以計算價格進行貨幣對價的時候，反而讓上海人的居住品質追求浮現了不同的參考項目（index）。

擁擠的家居生活中的另類隱私—「從女居」現象中的自我調適

大凡任何住宅的空間皆不會一成不變地被使用；家人的成長與衰老，事實上都反映在空間不同的需求上。在市場經濟制度下，這類需求上的改變是透過市場「交換」的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制以完成；變更的需求反映成為空間的剩餘或不足，並在使用者自行調配空間的使用方式後，將對自己已不適用的空間或資本積累的剩餘投注在市場上透過競價決定空間本身的市場價值，以貨幣交易進行空間的重新分配。但在社會主義的階段，由於國家一肩扛下了住宅市場提供住房及分配的功能，並終止了租購屋的市場，但國家卻又無力足量的提供可資交換的住房，從而促使了使用者必須以自力救濟的方式解決前述的問題。

當「一室戶」成為常態，上海的居住行為也出現了許多的調適；例如對 1950 年代之後出生的這一代普遍的「*從女居*」現象即是一例。「*從女居*」意指父母與已婚女兒同住的現象；字面的意思似乎是父母親遷入已經出嫁的女兒家中居住，但事實上在上海更多的是已婚的男方在婚後選擇遷入配偶的家中與配偶父母親、甚至是尚未嫁娶的兄弟姊妹們共同生活；這被認為無關乎性別的意識，而是住房嚴重短缺在民間出現的權宜因應，是「經濟情勢、人口結構與國家政策耦合所致」。[36] 也就是說，上海大量的「*從女居*」現象被認為並非意味著傳統上海社會潛藏的父權意識被鬆動，而是傳統父權文化面對生存條件的困窘，理智而權宜地允許上海父母因應現實與已婚女兒同住。[37]

訪談中一位世代居住於上海靜安區的上海復旦大學的某文學院教授回憶起文革時期兩位姊姊出嫁後不久卻選擇與夫婿一起搬回娘家居住一事。他描繪了垂直化的充分利用：

> 家中當時已經退居到二樓的一間大房，房間內就一張可以掀開的大木板床, 下頭可以擱東西，上頭睡覺。…床上幾尺高另外釘著橫著的木桿，下頭掛著蚊帳，上頭也還可以擱東西」；「這房間太小了，沒有擱東西的地方就全是晚上睡人的地方。

至於七八口人共睡一張大床的隱私問題，他生動地描繪出那一種私密界線浮動的邊界：

> 晚上睡覺時，父母先睡，再來是二姐一家，再來是大姐一家；大姊最後關門並上床。每個姊姊一家就是一頂蚊帳，一頂蚊帳下就是一個家庭。早上收起蚊帳，一大家子人可以坐下來吃早餐的位置又跑了出來，大家各自趕著洗臉刷牙去，姊姊也趁著沒小孩大人在的空檔趕快更衣準備上班……。

在問及為何兩位姊姊都要搬回來住，最直接的回答就是：「熱天穿得簡單點在自己爸媽前不會感覺不方便！」這一類的回答其實並非特例，許多與女方父母同住的已婚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性也表示，擁擠悶熱狀況下男性在配偶父母親面前適度地赤身露體（例如光著上身或僅穿一條短褲）不被在意；但對女性，在公婆之前衣著寬鬆卻有顧慮。此一說法意味著「從女居」讓女性在從小習慣面對的親人前面可以適度地在衣著與行為舉止上放鬆，也某個程度上解決了在擁擠的一室空間中共處的尷尬。

無論從起床後穿著睡衣出門刷牙洗臉，或是在某一特定的世代開始普遍接受的「從女居」模式，初期都是一種空間窘迫狀況下不得不然的「權宜」，之後被普遍接納成為一種生活常態，慢慢入主日常生活。這種擁擠下的包容與諒解，也往往在習而不查的日常生活經驗中，由原本僅可以在私密家居空間中解除心防的身體膽敢走出家戶，從眾多一室戶前公用的走廊、水槽與衛生間之前一寸一寸地向外擴張，到樓梯間、到弄堂口、到鄰里的市場與早點店，終至練就了公共領域中對外人眼中「衣衫不整」的不動聲色。在國家有限供應的住宅政策下，對私密的堅持退守到親密不外顯的防線最邊緣，已經退無可退，並成為一種生活的常態，並在其中建立了集體性的默契。個人的身體既面對了不可規避的空間窘迫與擁擠，也迫使了個人重新以新的角度看待自己的身體出入於私人—公共領域的方式。

有限空間中被剝離階級成分的日常生活身體

居住於上海的人群本就形形色色，各階層皆有。正因為不同的階層社群原先的家居慣習（habitus）也往往是其身份與階級認同的具體表徵，並適時地展現在社交生活的排場、衣著、飲食或衛生習慣上，並隨著喜好與理性，依據著各當時空不同的物質條件現況隨機地調整，也循此衍生出了不同階層間各自不同的生活哲學。但是，如前所述，「共用」(shared)既然成為社會主義統領初期必備的生活模式，社會主義平等意識型態下的政治正確，迫使居民逐漸意識道：關於「身份區辨」的文化符碼要謹慎地收藏起來，不輕易暴露。但真正讓居民剝除其階級身份符碼的，卻是物質條件上的嚴苛窘迫，迫使了各階層的人在居住行為上只能放棄身份的符碼與標的物，選擇「趨同」。

以本文之前「從女居」案例說明中兩位姊姊出嫁後返娘家共住的經驗個案為例，家中要可以容納多人的生活物資已屬窘迫，東西之外僅存的剩餘「空間」最終就是夜間身體橫放就寢的位置。如此窘迫的空間條件，早已迫使住戶放棄了許多可資辨識主體社會「位置」的憑藉。宅地空間中「空」的部分如何被住戶使用、如何被定義，不僅關係著住戶社會關係的建構，也是身體經驗可以開展之重要所在。居家的舒適性讓住宅得以不再僅是住宅，還可能帶有發展住戶社會關係的功能；將社交空間帶進家中，饗宴與留宿都因為私宅的開放而具備了社會關係上不同等及的潤滑意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租界時期某銀行襄理的兒子回憶道他父親讓出家中其他房間，自己家庭遷上三樓居住時，就已經被迫將一套招待客人的豪華紅木桌椅送人，只留下母親喜愛的紅木衣櫥、大圓桌與餐具櫥。這些上等酸枝木料精緻木作處理的傢俬，當然是曾經在銀行待過高位的父親基於社交的需要逐步添置的行頭；從家裡一樓停黃包車的車間，到二樓的大客廳與書房，說明了對於特定的階級，宅地空間早已不再僅是居住的需要，適時地將宅地空間開放作為主人社會關係擴展的基地，有時有更佳的人際網絡擴張效果。這些需求，向裡向外都有演繹與延伸：對內，既然要招待客人，用餐即不可免，廚房的空間相對地在規模上大於常民的宅地，甚至還有一個二樓梯間轉角的倉庫專門囤大米，讓戰爭時期家中不僅不斷炊，還能持續地藉由不寒酸的食物待客展現自己的實力。廚房規模的完備、僕役人數的增加，對內都反映在廚房的大小及奶媽房、管家房、傭人房等的空間數量上；這是外人看不到的服務系統部分。對外，則重點繼續放在如何延伸社交行為於用餐之外，持續鞏固與擴展既有的社會關係；在用餐前後能夠提供有話題的休憩活動即成重點。品茶自不在話下，品字畫則要更展現了主人的文化素養；裱裝懸吊起來的字畫因而與待客的紅木桌椅共存於二樓的大客廳，有些人家甚至有時還可以進入主人有一張大桌子作畫寫字的書房。

受訪者陳先生坦白承認，遷上三樓時家中的面積已經不足以寬裕地擺放這些器物，是勉強堆置在空間的角落當置物櫃，早就沒有原先富有人家亮出精緻雕工的排場。文革時紅衛兵來到家中，又以資產階級品味的罪名沒收了衣櫥與圓桌，並將一些父親收藏的字畫一併帶走。對已經中風行動不便的父親，由於早已沒有在家宴客會客的需要，倒也沒有多抱怨；只是對不佔空間可以持續收藏的字畫卻被強行帶走一事不勝欷噓。即至改革開放後鄧小平的領導班子「落實政策」要發還曾經屬於私人的被沒收佔用物品，當時的家中空間已再也沒有餘裕去接納那一度象徵品味、標誌身份地位的身外之物。

從前資本主義社會進入到社會主義，「去階級」的前後差異看似理所當然是一個核心的主題；究竟階級當成一個檢視身體經驗的面向，對身體經驗的探索有沒有幫助？從上海的實際訪談經驗來看，問的方式決定的我們可以看到的日常生活真實：如果我們質疑：不同的階級會不會有不同的身體經驗？並進一步追問：這些源於階級的身體經驗差異究竟會需求／召喚出什麼樣的家居空間？這種問法其實存在一種假設，將身體經驗當作單一主體，並且相信所有的宅地空間都是清楚對應著日常生活中身體明確的經驗需要而被營造的。但是，如果我們將社會主義階段種種的住宅空間及其間所發生的行為放在一個更長時間的演變歷程中加以檢視，我們卻可以發現住宅的空間形式與身體經驗以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住戶面對的集體社會文化，三者呈現了一種交相作用、**共同演化**（co-evolution）的發展。我們今日認為家中理所當然必須要有與浴室、廁所，這些現今都被視為是家居生活不可或缺的配備，但上海住宅的發展經驗卻告訴我們，這些經驗在千百年來的傳統中國城市都不曾全面地擁有過；租界時期引入水、電、瓦斯也不是為了湧入租界避難的難民的需要。但是一旦這些基礎設施管線制度性地可以進入住宅，身體經驗不僅就此被動的被開發，也漸漸入主成為選擇宅地的主要考慮因素。房地產市場順勢插手其間，操弄著實質的衛生條件與新住宅華美精緻的外顯形象之間模糊的連結，並不斷地在居住的身體經驗上加料，將感官經驗巧妙地商品化，甚至成為今日我們認為「一定必需」的標準。

Ierely（1999）在描述美國近代的郊區住宅發展時說道亦指出：現代的家用科技塑造了我們每日的例行活動，使得美國家屋成為一個「舒適的地方」。他的研究清楚地點出了家居的舒適與便利事實上建構在必要的物質條件之上；家用科技的發展與可以安置（accommodate）這些家用科技的必要「空間」是最核心的物質條件。美國在廿世紀初的郊區化擴張與商品目錄郵購促成了美國房地產與郵購商聯手合作，讓住宅成為身體經驗擴張的重要基地。郊區寬廣的生活空間允許了更大型的房舍與庭園，也允許了將原本擠壓在城市的生活機能分化放置在不同的空間中，並讓宅地與庭園都成為潛在發展社交生活的新選項。美國郊區化同一個年代將近十年後相同的狀況也發生在上海租界，中產階級開始在南市之外尋覓新的、與自己社會地位相稱的新住宅。郊區居住最直接的改變就是較為寬裕的空間，讓許多原先在舊城區的老式里弄住宅中無法進行的機能分化、隱私範圍的圍敝、甚至於個別家人專屬的私人領域都有可能發生。學校的教育、[38] 社會的輿論、[39] 與鎖定特定對象的雜誌媒體開始報導。[40] 這些城市擴張與住宅空間形式上的變化，身體經驗顯然不是主導的因子，但也決不是被動地被開發的感官經驗。它既是被習慣、兩性關係、禮儀規範與房地產商及住宅市場所能提供的具體空間形式所建構，但也是這些面向內化於經驗層次的體現（embodiment）。上海的中產階級絕大部分都與受訪的陳先生的父親類似，在這個時間區段參與了城市擴張的房地產開發，並藉由空間的消費與日常生活的實踐讓自己有機會體驗過去不曾經歷過的生活。並因為家中空間的寬裕，在自己財力許可的程度逐一地添置與當時自身的社會關係相稱的傢俬行頭支持宅地日常家居之外的其他功能需求。

前述的城市發展經驗說明了實質空間－身體經驗-社會文化之間的共同演化關係。那們，空間一旦不再存在，或至少不再配備於私有的宅地空間內，必須共用時，狀況又是如何？社會主義的統理階段，社會主義意識型態下以「平等」「節約」之名，根據人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面積在 1950 年代中期之後的住宅分配上劃下了 4 ㎡／人的一條線，並透過「公私合營」與房管所的中介，進行全上海住宅空間的介入監管。齊頭式的平等最直接的效應就是讓家居基本生活需要之外的其他附屬空間全部被擠壓殆盡；家居空間成為一個純然的生活機器，承載日復一日的生存行為。這是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統理斧底抽薪的一套作法，蓋階級的符碼、支持階級關係的種種條件事實上都必需要「再現」（represent）於空間之中，尤其是專屬於某一特定個人或家族的住宅空間。許多上海家戶一如受訪者陳先生的父親，在改革開放後對要落實政策送回的大件家具的敬謝不敏。受訪者默默的「已經沒有需要了！」一句話，不僅是擺不擺得下的實質考慮，更是對當下的社會關係是否額外需要再利用到宅地空間的自我權衡。

解放後到改革開放前將近卅年在新的住宅空間中的日常生活實踐，早已讓被官方認為「多餘」的行為消失殆盡，仍有需要者另覓他處；如錦江飯店這一類的高檔國營餐廳承接了正式的社交，街角的食堂、澡堂、盲人按摩館則是公眾的集體會客室，新的身體經驗也在這一方公共空間中重新醞釀並發展。官方不僅指定家居空間就是只要有居家該有的行為，也從最根本的物質條件上掐住了住宅空間中所有的可能性。但身體經驗與社會文化及宅地空間的物質條件如果是一種「共同演化」的關係，在解放後國家以強勢限縮為手段所催生的種種調適（appropriate）行為，一旦成為社會成員有極高共識、深埋（embedded）於文化與時代所認定的「常」或「慣例」之中，並成為一種日復一日地進行，無須刻意、無須思索的反射性肢體動作，這一種從身體本身被改造，甚少需要理性思辨與邏輯推理的日常生活習慣一旦成為一種集體認定的「常態」（norm），即使改革開放後市場制度復辟，重新商品化（re-commodification）的力量無遠弗屆，但就注定了得花更大量的氣力才能扭轉此一共同演化出的「常態」。

正是在國家對住宅市場的高度干預之下，上海市民日常生活中的「常」一度被拉到一種「非常」的狀態要去取代原先的「常」，這種「被視為」趨近社會主義意識型態理想的「非常」的確曾經成為市民生活的慣例與例行公事，即或改革開放後很多物質面向已經還原到接近「非常」之前原先的「常」的狀態，但很多內化於日常生活實踐的行為其實很難單獨拆開一一破解。2010 年上海辦世博會前仍在為穿睡衣上街、在大街上大聲喧嘩一事大聲疾呼市民要「自覺管理」，放在本文的脈絡中理解，這都是住宅／身體經驗／社會文化「共同演化」後的餘脈；它不輕易被人均面積的提升、家家有衛生間、小區有公共會客室、街角有公廁這些實質的建設指標與商品化所收編，持續地存在於上海街頭，並以集體之姿成為外人眼中獨特的市民文化。放在長的時間軸上從身體經驗解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空間，讓我們看到了物質文化與日常生活之間綿密但有趣的互動歷程。

結　論

本文透過解放後國家高度干預下的上海住宅生產與居住其間的居住者身體與宅地空間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動，去檢視並解析宅地空間的「物性」與身體經驗之間微妙的對應關係。研究首先整理了解放後社會主義國家的住宅政策及其具體的空間實踐，並將這些具體的空間實踐概略地區分為工業區與衛星市鎮工人新村「小區」的建設配套，以及既有里弄空間的重新分配。再由這些透過國家干預而建成的實質空間形式去解析其空間形式以及其間使用模式的變遷。由於兩類住宅的空間實踐都一定程度地接納了國家中介下引介而入的棚戶區居民，並在「去社會階級」的意識型態主導下，刻意地接納並混雜了同一階級成分的族群成員。因此，本文在描述並歸納了空間形式與使用模式的變遷之後，最終回過頭來將使用者主體放回宅地空間之中，嘗試去進一步解析從市場機制到社會主義分配的階段，居住者的身體作了何種的修正？個人的身體乃至於家庭與社群本身係如何自我修正以調適於新的集居形式之內？身體經驗的項目與內涵又有了何種的改變？

過去對上海里弄的研究曾經指出：居住的身體經驗係透過宅地空間的中介而形成，但宅地空間的形成與發展，在住宅市場中往往遷就產權、分割、通道、建築線及營造技術與材料等種種與身體經驗無關的因子，也同時建構於商品化的過程；並非全然遷就衛生、舒適的身體經驗法則（郭奇正 2006：169-70）。原因在於住宅的商品市場並無法將與身體經驗相關的居住形式或物件單獨切出來提供消費，住宅是以成套完整的空間形式、連結著宅地所在區位之環境氛圍，以及特定的歷史與社會過程所賦予的意義等整體性地與居住者身體互動。對居住行為的感受毫無疑問地建立在乾淨、衛生、便利、隱私等具體的身體經驗，但又不可避免地與抽象的想像與實質居住空間外顯的形式連結。正因為與身體經驗直接相關的諸多現代設施項目無法自外於宅地成為一種獨立選項--衛生間無法獨立選配，污水管線亦無法單獨申請安裝；可以鑲嵌身體經驗相關設備的合理空間形式配套（space-utilities sets）遂往往超越了舒適、衛生、便利經驗發生當下之設備本身，反構成了舒適經驗得以投射的主流商品形式，居住者的居住需求是透過對主流的住宅商品形式之消費來完成；這是租界時期以降資本主義上海階段的住宅生產。

而在本文所探究的社會主義統理階段，宅地的生產卻跳過了前述的產權、分割、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道與建築線等在資本主義的市場階段影響住屋形式的重要因子，直接源於國家的干預與意識型態所偏好的集居形式之引介。同時，居住者不再經由租／購的市場消費，而是經由國家或「單位」的分配取得住宅，因此，居住者對宅地空間的身體經驗之建立與開發就有了與資本主義的市場階段截然不同的過程與內涵。在國家所欽定的「標準住宅平面」與住宅區「配套」規範之下，由於市場功能被終止，而國家在標準平面規範之餘為求合理調適所允許的「換房」機制也由於住房供應量的不足而成效不彰，我們看到的是在社會主義的統理階段，住屋的分配在社會主義平等主義的意識型態強力主導下，齊頭式的公平僅能提供給居住者最低標準的住宅需求。這類居住者對於居住需求最低限的渴望是對國家「從無到有」的施惠與恩准最消極的回應，並退而在私密領域的居住模式上作修正；「從女居」、單元空間的重複使用、空間機能的複合而非分化，在在都是居住者在重新切割居住生活的公－私界面之後所做的種種調適。**公—私之間的身體因應模式**因而成為日常生活的身體經驗面對高度國家干預所產生的新項目。

從這個角度切入，國家欽定的「標準住宅平面」成為住戶積累身體經驗並逐步推昇其空間想想的基礎；「室」是最基本的身體經驗積累基地。事實上，租界時代身體經驗項目中在意的明亮、通風、乾淨、衛生等項目，官方若能承諾給予者也僅止於居室本身。但對任一家戶而言，過小的人均面積分配，這些身體經驗項目隨時可以輕易地被擁擠取代，打折享受。作為社會主義下的個人身體經驗培訓發展的基地，基地不足，當然就得找腹地。但是出了「室」之外，「共用」除非是非常有共識的維護，在公共廚房、衛生間與浴室等特定行為目的的空間，衛生與乾淨都得建立在鄰里之間的共識，個別的家庭成員無法全權掌控、自主維持。這種出了「室」之外就是公共空間，只是公共的層級與大街上的「公共」有所區別的居住條件，讓社會主義統理階段的身體經驗浮現了新的課題——**旁人介入家居生活**；尤其是對於早在租界時代及已經存在的里弄。

社會主義國家基於反階級與平等主義的意識型態，在住宅政策上傾向於讓屬乎家庭的「私密」極小化。但國家能夠介入干預的僅止於可以量化的物質層面，因此，前述「私密」的極小化是透過家居空間的極小化來完成，輔以鄰里街道內部就近的相互監控。原本應該、或者說在解放前的住宅發展過程中逐步被認定應該放在家中關起門來處理的私密行為，被迫與鄰居共同協調在「共有」的空間中進行。國家可以量化分配宅地空間，量化配套公共設施，但卻無力干預宅地空間中被擠壓而出的種種行為與需求。這些行為遂在有限的物質條件基礎上透過集體的默契與認知自我發展。「從女居」的權宜性作法處理了空間中多人共處一事的尷尬，以女方自己父母「自幼看著長大」的熟稔關係化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了已婚夫婦與公婆咫尺相鄰共處可能的摩擦與不方便。出了「室」之外，廚廁多人共用的默契，面對尖峰時段高度集約使用的時間限制，隨時待命上陣的要求需要的是身體自身對禮儀態度與衣著的適度解禁。物質條件的窘迫限制合理化了許多「共用」過程中行為上的權宜調適，當著大庭廣眾之前站著洗臉、刮鬍、整髮，捧著牙缸蹲著刷牙隨處吐牙膏沫都在等候如廁的備戰狀態下視為「識相」的善意；一天當中必須多次使用衛生間小解的需要，讓每個家庭成員都被迫多次出入於私密的「室」與公共的「衛生間」與走道，披掛可外出的衣著見人已屬麻煩，擁擠環境下頻繁地穿脫不同的衣著更屬不便。本來深處內寢的「睡衣」遂先被合理化為「家居服」，再以「家居服」的定義漸次向小解、洗手之外的借蔥借蒜、串門子等鄰里互動行為擴張，終至走出家門、上下樓梯，最終走出社區。

主體雖然受制於物質的條件，但主體對於身體的控制仍然是自主的，但是多了集居生活中的體諒與對於不便的忍讓。我們看到了解放後的上海里弄用非常權宜但「理性」的方式因應了「旁人介入家居生活」這件大事；物質條件的均質化分配，讓「旁人介入家居生活」普遍地被詮釋為「彼此介入彼此生活」；每個人都被干擾，但每個人也都是別人生活的入侵者。因此，個別居住者主體的身體對私密、對乾淨、對舒適、對不方便與方便都要有共識才能自處。物質條件既迫使了居民接受不要不一樣的「趨同」，也正是在這種不得不然的全面介入與滲透，我們看到了公與私在身體可以接受的底限上被重新定義，反過來，身體也找到了在公－私之間的自處之道。

解放前，上海住宅中的身體經驗其實最終是透過的商品化，讓身體經驗連結著宅地空間的外顯形式，使得舒適、乾淨、衛生這一類抽象的身體經驗得以有可以投射的實質形式，並透過空間的消費而被滿足；解放前這一類將身體經驗連結於宅地形式的「共同演化」歷程中，各類商品住宅形式上的紛紛嚷嚷背後是難以脫離商品消費不由自主的居住者身體。解放後，國家制度性分配下的上海住宅則是在「去差異」的宅地舒適形象拆解過程之中，讓真實的日常生活在有限的空間中自謀出路。除了意識型態上的政治正確判斷迫使身體作戲，使用者的身體如果可以回到關起門來空間中，其實不會主動剝去階級、不顧隱私、脫離慣常的價值與文化，自我尋覓自己可以接受的另一套戲碼；身體經驗項目是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長時間累積的結果。但國家的制度性分配反映在窘迫的居住物質條件上，迫使身體抹掉粉墨重新登場，在日常生活難以再遮遮掩掩的近距離接觸情境之下，接下來原本不屬於自己尺度與戲路的劇碼。

相對於解放前住宅形式上的多元，解放後上海住宅中介乎公－私之間的身體經驗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目說明了身體與社會價值的共同演化過程，身體經驗是被制度所穿透並支配，但居住者主體的調適也透過身體的解禁反映在種種的日常生活模式，並回過頭來召喚國家制度的改革。1980 年代中國以 14 個東南沿海試點率先進入全面的改革開放，1992 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上海的全面擁抱市場，其實都是從常到非常之間過度擺盪的修正。由上海的住宅發展，我們看到了由市場經濟走進社會主義分配體制的居住者身體看似「自在」地出入公／私領域之間，並不斷地以「似私」的形式佔有「似公」的領域。即或沒有「市場」，住宅的價值工程事實上不曾間斷；想像與慾望不曾脫離過實質的冷、熱、乾淨、衛生、便利等身體經驗，只是在不同的歷史社會脈絡之下，分別有不同的投射。由租界時期市場經濟下的商品住宅到解放後、乃至於改革開放後的社會主義住宅，上海城市集居形式的蛻變過程為了我們提供了檢視居住者身體與身體經驗的另一個標的。

附　註

1. 例如在探討「熱環境」的溫度與濕度關係時，建築物理學的教科書有一「快感舒適帶」的專有名詞。在將溫度與濕度對應起來的一個圖表中，透過實驗室中針對個人個別的偵測，推演出絕大部分人會感覺到舒適的溫度範圍與濕度範圍。亦即，相同的 25℃溫度下，但相對濕度 80%與 50%，可能不會有相同的舒適感。但 22℃／70%卻在 25℃／50%同樣處於多數人的快感舒適範圍內。這一類的評估必須單純化變項，不僅微風／強風的因素必須被排除掉，更遑論人種、文化等更為複雜但卻更能影響一個人對環境的忍受力的因子。
2. 最常看到的就是都市計畫中的「土地使用分區」，規劃者習慣將都市土地區分為商業區、住宅區等不同的土地使用，並強調住商混雜有損居住品質；許多住宅的開發商也喜歡在賣屋時強調「零店面」去標榜其對居住品質的重視。
3. 諸如里弄單元的配置、外在的視覺景觀、進入住宅的空間序列中迴車道、衣帽間、起居間、現代化的衛浴廁所等空間、以及戶外的小庭園等。詳郭奇正 2006：166-170。
4. 例如抽水馬桶一按即沖的便利、無須另行打水或忍受茅坑的氣味；或在自己家裡的浴室關起門來淨身，無須與眾人共擠澡堂的享受等。
5. 上海人統稱為「市房」，《上海碑刻資料》中也直接以文字的「市房」稱之。詳《上海碑刻資料》（上海博物館圖書資料室編 1980：20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6. 上海一地至今仍習慣將有沖水馬桶的廁所稱為「衛生間」。由於管線的考量，宅地空間中沖水馬桶與浴缸同時會就近安置，故較少有單獨稱為「浴室」者；稱「衛生間」者有時包括著浴缸或淋浴間等設備在內，有時僅有沖水馬桶與洗手台者，也稱為「衛生間」。

7. 現今的住宅裝修工程中，舊宅地的改建可以單獨進行浴室或廁所的改建的前提是自來水管、排水管與糞管已經設置完竣，或僅需要配合洩水坡度小範圍地延伸更改排污水管走線位置；因此，私密條件的提升在管線配備完善的區域是可以成為單獨地選項。但在管線尚未普及的上海老城廂及部分舊式石庫門里弄區，基礎設施的物質條件尚未容許支持前述的更動成為空間消費的單一選項，植入衛生間於舊式住宅中是所費不貲的投資。

8. 在自來水要進入室內並成為基本配備之前，不論中外一般傳統店屋當立體化為兩層樓以上時，樓版仍多為木造。有時為求隔音以避免相互干擾，會在底層木板上鋪覆乾泥再鋪設一層木地板作法因應；但都不能防水。

9. 水表與電表的安設，都共同促成的城市營造行為中「建築線」概念的普及。「建築線」意指私人地塊臨接到公共出入通道的介面，城市統理當局可以在城市的公共通道廣佈管線，「建築線」用以確保個別土地的所有人透過建築線即可將管線接入，管線無須穿越他人的私有地塊，減少協調與無謂的爭議。

10. 上海工部局工務處、衛生處與社會處檔案對此一現象曾有詳盡的調查與描述，英文統一以 unauthorized addition and alteration 描述之。

11. 英國曾於 1880 年代成立皇家集合住宅委員會（Royal Housing Commission），美國也曾於進步年代（the Progressive Era）於各大城市陸續成立以住宅改革(housing reform)為名的市民組織呼籲國家介入（state intervention）。上海則於 1930 年代初在工部局之下成立了集合住宅委員會（Housing Committee）。詳郭奇正 2010：255-256。

12. 上海民用設計院早期曾參與過曹陽新村規劃設計的總設計師許漢輝先生訪談紀錄，2006 年 7 月。

13. 依據台灣估算面積大小的習慣，亦即含公共設施的面積大約九坪，實際能關起門來外人無法使用的自宅空間約略僅有 6 坪，約略是台灣大學院校四人宿舍的面積大小。

14. 「公私合營」是社會主義統理過程中將私有產權逐步「國有化」的一項過渡性作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主要是以「合營」之名強迫私有產權之業戶同意讓政府入股持分其產權，政府產權之對價價金則由政府承諾分年償還，最終是讓私有產權之業主完全不再擁有其產業之持分股份。

15. 經歷過「公私合營」的整編後，上海僅有非常微量的私有獨棟住宅還能維持私有的形式，並因為沒有交易市場，而得以持續地保持其私有的形式到 1990 年代之後成為外資介入上海老洋房市場時搶手的「產權房」。絕大部分的私有住宅均被「公私合營」制度變相地充公。

16. 「花園城市」（garden city）的概念濫觴於霍華德（Ebenezer Howard），但由於霍華德並非專業的建築師，故其花園城市理念在後來係透過建築師 Raymond Unwin 及 Barry Parker 的手在英國 Letchworth 一地實現。英國地理學者 Peter Hall 認為花園城市的理念是因緣際會地透過 Unwin 與 Parker 給了這個社會城市的理念一個具體的形貌，且是一個可以遙遙呼應英國源自於 William Morris 時代手工藝聯盟運動的文化傳統的美好的形貌，以致於英國的地產市場陸續「演繹」了落實於 Letchworth 的花園城市空間形式，但抽離了當中要有工廠環伺提供工作機會、刻意要維持扁平的社會組織、以及以住宅合作社形式購地興建的開發模式。故 Hall 以花園城郊（garden suburbs）區別霍華德的「花園城市」與英國當時陸續出現之類似形式的開發計畫。詳 Hall 1988：94-8, 87, 114。

17. 許漢輝先生訪問記錄，2006 年 7 月。

18. 「超大街廓」（superblock）是 1920 年代汽車普及後的一種規劃風潮，旨在透過現代主義理性的觀念，以較寬闊的大馬路去圍塑出一個不被機動車動線干擾的街廓內部，藉以取代過往城市街廓為鄰里巷道圍起的傳統街廓。但是較大的街廓內部還是有機動車輛服務動線的需求（例如搬家與建築物的維護），故在當時多以「囊底路」（cul-de-sac）的作法因應。超大街闊往往搭配著沿街建築物的退縮，以及鄰棟之間寬廣的綠地，在當時顯然與現代主義之前的傳統都市在城市景觀上有極大的差異，故也被視為一種現代化的表徵而被普遍應用於郊區的建設或都市更新。當時的城市規劃者 Clarence Perry 也力主 superblock 的概念，認為這關係著一種新的「鄰里單元」（neighborhood unit）的建構，提供了鄰里居民免於汽車干擾的可能性。1930 年代之後這類的作法多見於美國的城市更新（urban renewal），但其取用的動機卻來自於消彌在當時被視為犯罪淵藪的「後巷」（back alleys）空間。顯然，源於汽車干擾下的規劃概念被引介至尚未全面機動化--小汽車持有量甚低、自行車持有量極高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海市區，有另外的考量。

19. 街道管理委員會是中共地方政權的末稍，功能類似台灣現在的村里辦公室。上海以一個到兩個超大街廓設置一個街道管理委員會的作法也就遙遙地呼應了 Clarence Perry 的「鄰里單元」訴求。

20. 詳王樸 1956, 新華社 1955,《人民日報》編輯部 1955a,1955b,1955c,1956a,195b,1956c, 1956d 等報導。

21. 根據《1958 年上海市民用建築設計參考標準》中，明訂 4 ㎡是人均居住面積的最底限。並由此訂出「一戶一室」單元 12-16 ㎡、「一戶兩室」單元 28-48 ㎡、「一戶三室」單元 30-36 ㎡的標準。

22. 許漢輝先生訪問記錄，2007 年 10 月。

23. 例如對於任一四房兩廳兩衛的中產階級「新式里弄」或花園里弄，在開放分租的狀況下，原屋主或二房東會針對多少戶共用一間衛浴設備訂出不同的分租價格。例如：早期有些宅院的主臥房為求方便讓佣人在主人起床前清理好衛生間，主臥房專用的衛生間會另有一面對公共梯間的小門。有些屋主保留自身獨用該衛生間的權利，會將小門封閉，單獨由主臥房出入。有些屋主則為求多收些租金補貼家用，會開放兩門共通，讓自己與其他分租者可以共用該衛生間。

24. 中國共產黨新建置的戶籍管理制度的變化以 1958 年為界，可以清楚地分為兩個階段：1958 年以前，屬「自由遷徙期」；戶口的移動並不管制。1958 年之後到 1978 年的改革開放，可以稱之為「嚴格控制期」；人口的流動納入嚴格的全面管制。當中關鍵的 1958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並頒布了社會主義面對戶籍管理的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制度，確立了一套嚴格的戶口管理制度；常住、暫住、出生、死亡、遷出、遷入、變更等 7 項人口登記項目均制度性地嚴格規定及時申報。此一嚴格的戶籍登記制度是為了進行關鍵性的「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上海市民習慣稱之為「城市戶口」）的分頭管制，由於社會主義制度是由國家一肩扛起所有社會福利的供給，兩大戶口類別的分流被認為是有助於糧食配額，單位住房，或者公費醫療的有效提供。

25. 受訪者中一位前銀行襄理的兒子回憶到，對日抗戰時期家中就已經收留過逃難滬上的「族親」四家人，但當時係由其父親在一樓停黃包車的穿堂增設一簡易的（俗稱半套）衛生間與廚房，方便新遷入者權宜使用。「三反五反」後雖然「公私合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制度並未充公他父親擁有的房舍，但「房管所」已經介入要求他家讓「街道」(類似於台灣的「里」的戶政單位）中無屋的家戶進駐。他父親遂決定家人遷居到三樓及屋頂閣樓層，保留家族成員含奶媽共五人獨用的衛生間。原本二樓的大客廳、餐廳及三間臥室與一樓空間與廚房讓出來供其他九戶人家居住，共用一套半衛生間及廚房。此一狀況維持到文革時期紅衛兵進駐沒收家中最後的一批傢俬、屋主退居閣樓、其他新遷入者遷入三樓與屋主共用三樓衛生間與廚房後告終。

26. 根據 2006 年陳正書先生、2007 年許漢輝先生、2008 年 D 先生訪談記錄，尤其是 D 先生的訪談記錄中，更是清楚地指出曾作為企業主的父親在思南路的高級洋樓花園住宅如何被房管局強行安置了十戶住戶進入。

27. 在家戶空間內可以發生的行為項目中，有些行為不一定可以共享或願意共享；如家人共餐這件事情。即或廚事的操作可以拉出家居的私密空間之外，但與家人共同用餐這件事情還是許多家戶的堅持；「餐廳」遂成為家居空間中一項可以與機能對應的空間名稱。以「廳」名之以區隔於「室」，說明了在私密的層級上空間屬性的差異；「廳」也因而意味著一個可以不需要被「門」所界定的空間，與可以關「門」、被具體圍閉起來（enclosed）、並可明顯辨識「進入與否」的「室」有了較為清楚的區別。一旦家居空間中的行為全部得置於一「室」解決，前述的分化被迫以「角落」行之，或以權宜的方式為之：例如掀開床墊用硬木板的床版當飯桌、或在床上吃飯等。

28. 根據筆者的訪談經驗繪製；為求讓不熟悉平面圖的讀者可以理解本段文字與平面圖之對照關係，本平面圖係根據胡揚所攝之退休工人馬威生先生之家居生活相片轉繪(詳 胡揚 2006:122)。

29. 同圖四，根據筆者訪談經驗對照胡揚所攝之退休工人與外來民工之居住狀況描繪成平面圖（詳 胡揚 2006：25, 54）。

30. 根據筆者訪談經驗，對照羅小未一書中天井生活型態的影像記錄，轉繪成平面與剖面示意圖（詳 羅小未 1997:152,153）

31. 筆者 2007 年對張濟順的訪談筆記。即或筆者 2001-2 在上海駐點田野工作的經驗中，這類共用廚房的經驗仍然使得筆者在未出門的休假日上午可以從上午十點不到即可開始以鍋鏟聲開始感受到各家出入共用廚房的緊湊，同時以嗅覺猜測各個不同家戶的烹調習慣；同一時間在上海駐點的國外研究者在言談中也都可以分享類似的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活觀察與體驗。

32. 例如 1950 年代末期「大躍進」之後，住宅建設被視為是非生產性的投資，數量上大幅縮減，「節約」一詞並由此階段開始蔚為顯學。在住宅的生產上，不僅追求構造的極簡，也要求公用設備的最少量化。這一階段建造的房舍由於居住條件最差，多半在 1990 年代末期之後率先拆除重建。1970 年代中期文革之後，居住的條件是有意識地放寬，也開始興建配套水準較高的公房。故每一階段國家欽定的住宅標準決定了居住的條件與共享的程度，居民無法自主決定。

33. 以研究者 2004 年自身暫住分租徐匯區建國西路花園里弄中一室戶的經驗，搭配對上海籍住戶及遷入上海外地人的訪談所得。

34. 詳張濟順 2004。

35. 由於從 1950 年代中期的「公私合營」開始，許多的住戶即開始面對自己原先的家戶中住進其他的非親屬住戶，這種狀況到了 1960 年代更盛，尤其對資產階級掃地出門的階段，許多中產階級家庭被迫退居到原先自家的車庫或警衛室，讓出自己家中的居住空間給房管所安排遷進的人。因此，上海人向來習慣低調地宣示家戶的「領域」，俾避免成為房管所調整空間分配時率先選中的對象。

36. 簡文吟在其〈父系社會下的從女居現象－台灣與上海的比較研究〉一文中指出：上海父母與已婚女兒同住現象遠比台灣普遍，但這種「從女居」現象的發展似乎和性別意識沒有太多的關聯，而是經濟情勢、人口結構與國家政策的偶合所致。簡文吟所關注的對象當然包括大範圍的上海農村與都市地區，不是僅有都市地區。她認為農村地區的高比率「從女居」現象源於僅生養女兒之父母必須仰賴和女兒同住以終老，但城市地區則是由於住房短缺而需要寄住在女方家庭。詳簡文吟 2001：65-94。

37. 相對於上海都市地區，上海的鄉間父系原則仍盛行，大多仍堅持以「招女婿」的方式來因應需求。所以簡文吟認為並非父權意義無條件地被打破，本質上父權意識在傳統中國社會仍然盛行。

38. 1910 年代極負盛名的「中西女塾」開始設置一間類似家政教室的空間，要求在校的女學生將家中的物品帶來學校布置該教室。在校女學生之間的比較、學習、模仿、調適因此一一發生；根據校刊描述，這也是當時學生甚為喜歡的教學活動。詳周明璔 19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39. 例如上海的《時事新報》對報導該類的活動即不遺餘力。時事新報甚至於 1931/08/13 以一篇名為〈國人樂住洋房的新趨勢〉公開頌揚西區的新式里弄，並鼓勵以租代購，搬進西區的新式里弄居住（競舟 1931/8/13）。

40. 例如上海的《玲瓏》雜誌即是一本鎖定時代新女性的重要刊物。刊物中皆會針對家居生活、服飾等做介紹性的報導。

引用書目

人民日報編輯部

1955a 〈社論 反對建築中的浪費現象〉。《人民日報》3 月 28 日：第一版。

1955b 〈社論 反對空談節約〉。《人民日報》7 月 1 日：第一版。

1955c 〈端正對節約方針的認識，避免新的浪費〉。《人民日報》08 月 28 日：第二版

1956a 〈批評建議的反應〉（國家建設委員會避免各單位亂蓋房屋的決議）。《人民日報》4 月 1 日：第六版

1956b 〈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前基本建設中的三個問題建築工程部部長劉秀峰同志的發言〉。《人民日報》9 月 29 日：第七版

1956c 〈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的發言舊工業城市的充分利用與城市改建--趙祖康代表的發言〉。《人民日報》6 月 30 日：第十一版

1956d 〈上海市有些機關辦公房過多，調整房屋將是機關節約主要內容〉。《人民日報》12 月 20 日：第四版

上海市人民政府

1958 《上海市居住街坊規劃定額暫行指標》。不著出版項。

上海房地產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9 《上海房地產志》。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

上海住宅建設志編纂委員會編

1998 《上海住宅建設志》。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

上海博物館圖書資料室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80 《上海碑刻資料選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編

2001 《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八十年》。中國共產黨八十年專系。頁 396-399。

王 樸

1955 〈充分利用臨時工棚〉。《人民日報》1955/06/21 第二版

史景遷

2003 《追尋現代中國－從共產主義到市場經濟》。臺北：時報文化。

林岳震

2005 《解放後至改革開放前上海城郊的社會主義改造》。東海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汪定增

1956 〈上海曹楊新村住宅區的規劃設計〉。《建築學報》2：1-15。

周明瑼

1917 〈新校舍記〉。《墨梯》（中西女塾校刊）1917：16，上海檔案館，檔案編號：Q0-12-552~574。

秋 香

2010 〈2010/12/15 上海時尚睡衣人 網友威兒剛熱情分享〉。「卡卡洛普宅宅新聞」http://news.gamme.com.tw/46867 與 http://news.gamme.com.tw/46867/2，2012 年 2 月 2 日上線。

胡 揚

2006 《上海人家》。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郭奇正

2006 〈衛生、城市現代基礎設施與商品化過程中的身體經驗：上海里弄住宅的社會形構〉。《考古人類學刊》65：135-176。

張濟順

2004 〈上海里弄：基層政治動員與國家社會一體化走向〉。《中國社會科學》，2004（02）：178-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新華社編輯部

1956 〈調整用屋騰出空房解決幹部住宿困難　上海市勞動局的作法很好〉《人民日報》12 年 30 日：第四版

鄒時萌與蘇則民（編）

1994 《中國城市地圖集(上)》。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

簡文吟

2001 〈父系社會下的從女居現象－台灣和上海的比較研究〉。《婦女與兩性學刊》12：65-94。

羅小未與伍江（編）

1997 《上海弄堂》。上海：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競　舟

1931 〈談國人樂住洋房的新趨勢〉。《時事新報》1931 年 8 月 13 日

Hall, Peter

1987 Cities of Tomorrow: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in the 20th Century. London: Basil Blackwell Ltd.

Howard, Ebenezer

2000 《明日的田園城市》。金經元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Ierely, Merritt

1999 The Comforts of Home: The American House and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onvenience. New York: Clarkwon N. Potter.

Justin Guariglia

2008 Planet Shanghai: Architecture Family Food Fashion and Culture of China's Great Metropolis〈上海：睡衣這樣穿了許多年〉。《南都週刊》368 期 http://www.nbweekly.com/qt/200911/10828.aspx 與 http://www.nbweekly.com/magazine/cont.aspx?artiID=9858，2012 年 2 月 2 日上線。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